

杜維運・黃進興編

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二

華世出版社印行

杜維運
黃進興編

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(二)

華世出版社印行

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(一)(二)

杜維運 編
黃進興

中華民國 65 年 9 月 初版

中華民國 68 年 10 月 二刷

出版者：華世出版社

局版臺業字第 0247 號

台北郵政 13—341 號信箱

發行人：奉壘泉

發行者：華世出版社

辦事處：台北市景美興隆路一段70巷11弄13號

郵撥：103989號 電話：9321411號

精裝二冊

定價新臺幣 500 元

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

一個批判性的探討

目次

- 前言：往事不可追憶
- 第一章 緒論：後現代主義與「歷史之死」 01
- 第二章 反人文主義的史學：傅柯史觀的省察 09
- 第三章 「歷史若文學」的再思考：海頓・懷特與歷史語藝論 55
- 第四章 閱讀理論與史學理解 99
- 第五章 「文本」與「真實」的概念：試論德希達對傳統史學的衝擊 133
- 第六章 敘事式歷史哲學的興起 173
- 第七章 後現代史學的報告（代結論） 211
- 附錄 中國近代史學的雙重危機：試論「新史學」的誕生及其所面臨的困境 229

斷代問題與中國歷史的分期	雷海宗	一〇一六
中國史學對於日韓越的影響	朱雲影	一〇四三
中國史學之雙軌	柳詒徵	一〇七〇
中國史學思想的概述	呂謙舉	一〇七五
中國史學之特點	錢穆	一〇九八
史學與世變	沈剛伯	一一〇九
記所見之二十五年來史學著作	牟潤孫	一一二一
論今後的國史	勞幹	一一五二

清代浙東之史學

陳訓慈

一、浙東史學之淵源

清儒二百餘年之學術，卓著整理推宏之成效，而史學之研求，在學術史上尤蔚爲巨觀。王靜安先生嘗謂清代小學經學史學，皆足以陵駕前代^①。實則經籍之考證，文字之研治，往往足以間接發明史學，則謂清儒之學有造于史學者最多，無不可也。餘姚黃梨洲生明清之際，爲學賅博，而流風所被，最足爲清代史學開山之祖。梨洲授徒著述，浙東之士從學者則多承其史學。自效以降，甬紹碩學大師，前後相承，在清學之中，釐然有統系之可尋，而其造詣並著于史學。夫學術爲公，原不必域地分宗。然功力既異，學風斯歧。至如一代大師，開闢徑徑，師教鄉習，濡染成風，前後相維，若脈可尋，尤常有不期然而然者。故以地域統系治學史，往往足以顯文化隆替轉移之跡，而如浙東學術之特著于史學，在清學中尤足以自樹一幟者也。

清代浙東之學，近承姚江性命之教，而遠紹兩宋儒哲之傳。源深者流長，理勢然也。兩宋三百年之間，大儒蔚起，浙東學者治性命之學者，與中原相望，而永嘉、金華、寧波三處之學風爲尤盛。明州理學，在北宋已有大師。當濂洛之學未興之時，慶曆五先生（仁宗時）已並起講學^②。其時王荊公會任鄞

令，于諸儒推重有加。五先生弟子多隱居講學，惟豐相之（名稷，國子祭酒）以學顯。南渡以後，浙東益爲文物薈萃之邦。高憲敏主講太學，士林宗仰。其後晦庵講學，從游甚廣，而浙東之士，則尤沐象山之教。淳熙四先生③師事象山，于陸學最有昌明之功。大涵焦先生自魯避地來浙，則別傳洛學于甬上④。其在朝者，如樓攻媿（名鑰）以文辭繫時論之重，而史浩勲（名富貴）尤以導揚理學爲務。史公晚年致仕，居鄞之竹洲。而所謂淳熙四先生多來主講甬上（舒廣平則服官在外）。其間沈定川主竹洲書院，其弟季文則館于史氏，而金華呂東萊（祖謙）之弟忠公（祖儉）來官于鄞，與史公往還講論尤密，世稱竹洲三先生⑤。迄于宋季，吾鄉黃東發（震）宗述婺源，陳習庵（塤）承象山之緒，而王深寧（應麟）則得呂學之大宗，世稱同谷三先生⑥。蓋四明理學，大師相承，發迹于安定泰山講學之初，迄于末葉而勿替焉。

宋世浙東文教之盛，四明之外，所謂永嘉學派與金華學派爲尤著。永嘉之學，出于伊洛之傳（二程子約生晦庵百年以前）。永嘉九先生多出程伊川門下，而許景衡、周行己最著。迄于南宋，鄭敷文（名伯熊）、薛艮齋（季宣）復興永嘉之學。陳止齋（傅良）、葉水心（適）並出鄭氏之門，光大其教。其在金華，則有呂東萊（祖謙）、唐說齋（仲友）與陳同甫（亮，永康人，舊亦金華）三大師並興，與永嘉諸子往還講論，深相引契。東萊生晦庵同時，爲學兼取朱陸之長，輔之以中原文獻之傳，而自成其至。同甫好言事功，說齋以經制之學孤行其教，爲朱門所排⑦。東萊之弟忠公游宦于鄞，故與四明學者亦聲氣相求。全謝山謂吾鄉自宋元以來，學風彬彬，號稱鄒魯⑧。實則兩宋之間，浙東各地儒哲輩出，講學躬行，蔚爲文教之邦，固不僅四明然也。

元代大儒，如許（衡）、金（履祥）諸氏皆篤守程朱之說，而浙東學者，猶多兼承象山之教。性理之外，往往兼治經史覈實之學。如元季詔修宋遼金史，甬人袁瓊出其先世遺書有關史事者上之，諸史之成，多所取資，袁氏嘗從王深寧游，以學顯于朝，可謂無忝先緒。降逮于明，薛敬軒（瑄）、吳康齋（與弼）爲理學宗師。康齋弟子陳白沙（獻章）講學粵中，門徒最盛，世稱廣宗。然浙東文物之邦，名公巨卿，如浦江宋文憲（濂）、義烏王忠文（禕）、甯海方正學（孝孺）亦皆篤學危行，見重于時。宋元先哲之緒，未嘗盡墜焉。

王陽明先生挺生姚江，泛濫諸家，歸宿于良知之說，所在講學，門從甚廣，浙東之士，始益聞性命之教^⑨。山陰劉蕺山（宗周）承陽明之緒，闡慎獨之旨^⑩。姚江黃梨洲從蕺山游，得王學之傳而光大之，而尤有造于史學。梨洲門從濟濟，浙東學風賴以復振。蓋浙東學術，所以上追宋元先哲之傳，下開梨洲以降之學，承先啓後，實賴陽明之教。而就清代浙東之史學而論，則當以梨洲爲開山之祖矣。

關於浙東史學之淵源，近人何炳松君曾有所討論。何君撰「程朱辯異」一文（見東方雜誌二十七卷十號至十二號），考程朱學說之異，頗多新語。惟其結論論程學之流傳，以爲小程子學說嫡傳入浙，故「浙東學派實是程氏學說的主流」。又謂浙東金華一支後起之呂祖儉，「把金華的史學第一次傳到四明去」。其意似謂梨洲以降浙東之史學承自南宋金華永嘉之理學，間接則出自程伊川之傳，而以呂祖儉爲傳授之中介者，則以作者之愚見，似多討論之餘地。蓋梨洲以降之浙東史學，究若承王學之餘波，而與程子之關係則似疏遠不易尋也。試略言之：其一，永嘉九先生固大半「學于程門」，然明州（甯波）之慶曆五先生開浙東理學之先河者，則多與程伊川同時，年輩

且多長于程子（如桃源先生〔王說〕生于一〇一〇年，伊川則生于一〇二三年），受安定泰山之啓示容不可沒，而決非受程子之教。其二，南宋初自魯來鄆之大涵先生（焦瑗）雖出程伊川之門，倡導風氣。但其後明州之淳熙四先生（南宋時）並師事象山（四公入太學，先親炙象山之兄復齋〔九齡〕，後皆師事象山，宋元學案列定川爲復齋弟子），立說雖亦會通諸家，要以陸學爲歸，並非程子之教。是則浙東之四明一支，昭然出于陸學，何能謂南宋後之學術，分爲朱學陸學與以程子爲領袖之浙東學三支？（參看何君原文）其三，呂忠公（祖儉）任明州監倉官，因與淳熙諸先生及史丞相往還講論，據此以謂四明學者受金華學者之影響固可，謂陸學與程學得相溝通亦無不可。然因此一事，遂以「把金華史學傳到四明」之大業歸功于呂氏，謂浙東學第一期由金華分出四明一支，且暗示明季以後之浙東學即承自金華之學或所謂「程子之嫡傳」，則是爲欲證明其假說，不惜曲解史蹟矣。其四，梨洲受學于蕺山，蕺山雖遠宗康齋，要亦默契陽明，而梨洲治學尤多承陽明之緒。此非僅章實齋有「上宗王劉」一語可據，即梨洲亦自認之。陽明之教，固未必獨宗一家（陸王並舉原爲後人之詞），但究與象山之教較近，而與程子之關係殊疏。而何君原文既不道及陽明開近世浙東之學派，更不復討論浙東學者「宗陸而不悖朱」（章實齋語）一語之有無所據，而遽籠括古今，斷然而創爲一說曰：「浙東學說完全淵源于程頤」（參看何文，東方廿七卷十二號六九頁）。其不免近于武斷，當爲謹于述學者所不能否認。要而言之，近世浙東之史學，淵源深遠，永嘉金華之先哲，自不無導揚先路之功，即其後學者受小程子之啓示者自亦有之，然不能即以此而斷謂浙東史學即是小程子之嫡傳。宋代理學大師，立說往往受多方之影

響，而非如後世漢宋朱陸門戶相爭時之嚴立壁壘（其實皆嚴立壁壘時，亦交互影響）。浙東史學所承受者廣，吾人不欲遽謂爲程學之傳，亦正猶不能斷謂全出陸學或王學然也。作者于性理之學全無門徑，祇以論浙東學之淵源，附陳其意如此。質之何君及讀者，以爲何如？

二、清代浙東史學之統系

章實齋曰：「浙東之學雖出婺源，然自三袁之流，多宗江西陸氏，而通經服古，絕不空言德性，故不悖於朱子之教。至陽明王子，揭孟子之良知，復與朱子牴牾。戴山劉氏本良知而發明慎獨，與朱子不合，亦不相詆也。梨洲黃氏出戴山劉氏之門，而開萬氏弟兄經史之學，以至全氏祖望輩尙存其意，宗陸而不悖于朱者也」。又曰：「顧亭林氏……自是浙西之學。同時有黃梨洲氏出于浙東，……上宗王劉，下開二萬，較之顧氏，源遠而流長矣」①。溯浙東學于宋儒而暢論其在清初之流傳者，殆以章氏之言最爲著明。後人論清代學術多據其說。實齋之生，及見謝山，（全謝山歿于乾隆二十年，實齋生于乾隆二年）寢饋鄉習，有志史學。與其鄉友邵二雲砥礪相得，隱然並承浙東之學脈。其後定海黃薇香玄同父子，通經服古，雖學風略異，要足爲浙東學後起之餘波。故自陽明以降，迄于黃氏，脈絡相繫，卓然自爲浙東之學。

浙東之學，自有種種特殊之精神。其在宋世講天人性命之學者，大抵不托空言。章氏所謂宗陸而不悖朱，則會通諸家，似可爲宋代浙東學術之特色。然宋儒之學，茲篇所不及論。若斷自陽明以降，或以清儒爲限，則其造詣之著于史學，允爲近世浙東學術之特徵。章氏之言曰：「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于

史，此其所以卓也。」^①此在宋明以來而已然。若至清代，終且以史學代理學而興，而梨洲實爲其間之關鍵。梁任公氏治清代學術，亦亟稱「浙東學風，自梨洲、季野、謝山以至于章實齋，釐然自成一系統，而其貢獻最大者，實在史學。」^②實則浙東之士攻研史學，由來已舊。宋明以來，言性命者已多治史。章氏謂「南宋以來，浙東儒哲多攻史學。宋明兩朝紀載，皆藁薈于浙東，史館取爲衷據。」^③浙東史學之席豐履厚，可以見矣。

姚江理學，後人論之者甚多，亦非炫文討論之列。要其泛濫經史，而始歸宿于心，初非空談心性，流爲玄虛。觀其示門人之言曰：「以事言謂之史，以道言謂之經。事卽道，道卽事。春秋亦經，五經亦史」^④。蓋明示性理必本之人事，而羣經皆可爲史乘之助。故陽明雖不以史學著，而其注重以歷史方法治學，已不無開創風氣之功。至其發於事功（如平贛破猺），尤足爲後此學者經世精神之先聲。惟姚江之教既廣，末流浸有流於玄虛參禪者。劉戡山起承其敝，舉證人講會於越中。爲學以誠意爲主，以慎獨爲功。而言必徵經，行尙實踐。所著人譜以統貫性命德行之理，必復尋繹古人言行，附麗之以成類記。是其雖昌理學，要亦深於史者。戡山弟子卓然可傳者二十餘人，而姚江黃梨洲最大。梨洲之學，博大浩涵，承王劉實踐之教，而以經世爲極則。於陽明之說，宗而不拘，論者稱爲王學之修正者^⑤。匡復之師既敗，梨洲以遺老隱居講學，故國之思，發之於史。浙東之士，多從之治有本之學，而鄞縣二萬君最著。萬充宗（斯大）竺志窮經，成禮學之淵藪。雖以經學名家，要實有功古史。萬季野博問強識，闡然自守，以布衣領明史館，奮獨力成明史稿。梨洲教澤，賴以光大。全謝山私淑黃萬，不忘故國之思。奔走山海，搜討遺音，重修講社，表章先哲。文獻之學，爛然有光。更續宋元學案，以竟梨洲未畢之志。

謝山既歿，紹興有後進二人，並有志於史學。姚江邵二雲好治宋儒之學，毅然以別作宋史自任，惜齋志以歿，美志未效。會稽章實齋負才疾俗，獨奮孤旌，論史學之義例，定述作之標準。自以上追劉（知幾）鄭（樵），爲千古史學開關櫟蕪。既不及身與國史，乃展其史才於方志，其體例別識，多爲後來修志者所取法。道咸以後，浙學中衰，阮文達仕于浙，考證之學漸興。而定海黃氏父子窮經好古，尤隱然足爲浙東史學之後勁。實齋歿時，儼居已生於舟山（實齋以嘉慶六年歿，黃儼居生於乾隆五十四年）。其言守心慎獨，遠契戴山之教，而所著周季編略，尤可徵其治經而歸宿於史。玄同幼承父教，尤深三禮，禮書通故一書，不惟集禮學之大成，且亦爲古代典章文物之淵藪。嘗主講南菁書院，江南名士多出其門。定海在明季爲忠義之邦，而清初文教勿彰。迄于清季，向學之士漸衆。蓋姚江四明之教，越海東被，二先生之教也。

綜斯以觀，清代浙東之學，實承陽明之教，縣延相承，迄今猶爲後學樹之風聲。陽明戴山導其先路，所造于性理者爲卓。而自梨洲以明代遺老，倡導學風，于是浙東學者繩繩相繼，莫不以史學著稱。降迄今日，吾鄉宿學大師，或閉戶潛修，或主講黌舍，猶多以史學知名。蓋學風遞嬗，浸成鄉習，源深流長，由來以漸，非偶然之故也。作者生長四明，每徘徊先哲之遺址，緬懷當年講誦之盛，涉獵遺著，粗窺旨要。爰斷自梨洲，降迄定海黃氏，略述其著于史學最卓者于篇。特先儒之學，浩瀚閎肆，茲文旨在通曉，未能闡明百一。管窺蠡測，非云述學，既以致仰慕之思，亦期爲學者感興研事之資云爾。

三、黃梨洲之史學

近人謂清代浙東之學，全部出自梨洲。語其梗概，則陸王之理學爲體，而史學爲用也^⑥。蓋梨洲以父遺命，師事劉蕺山，而以陽明同里後學，尤承王學之遺緒。而追本窮源，更有得于宋明先哲之傳。全謝山謂其以濂洛之統，綜會諸家，橫渠（張載）之禮教，康節（邵雍）之數學，東萊（呂祖謙）之文獻，艮齋（薛季宣）、止齋（陳傅良）之經制，水心（葉適）之文章，莫不旁推交通，連珠合璧^⑦。其象數之學，復有得于漳浦（黃道周）。故梨洲爲學之淹博，有過蕺山。凡羣經百家史學法制兵農輿地天文曆算乃至佛經道藏，莫不究心。然以忠端之遺教，尤熟習史籍。

先忠端公就逮時（案忠端名尊素，東林名士，以訐魏闖被逮，死于獄），途中謂某曰：「汝近日心竊，不必看時文，且將架上之獻徵錄，略涉讀之」。自後三年，始讀二十一史，皆因先公之言也。（黃梨洲補歷代史表序，亦見全著神道碑）

蓋明季學術衰敝，士子囿于性理，汨于制義，好爲游談，束書不觀。梨洲起而挽其頹風，於陽明「致良知」之義，倡「一致卽是行」之新解，矯王學末流之弊^⑧。教學者博覽經史，從事覈實之學。

全謝山甬上證人書院記：「自明中葉以後，講學之風，已爲極敝。高談性命，束書不觀。其稍平者則爲學究，皆無根之徒耳。先生始謂學必源本于經術，而後不爲蹈虛，必證明于史籍，而後足以應務。元元本本，可據可依，前此講堂錮疾，爲之一變。」

蓋明清間之大師，大抵承宋明之理學，而能矯其末流空疏之弊。性理經史，無所偏廢。而梨洲之教，尤爲深切著明。故其言曰：「當以書明心，無玩物喪志。」^⑨又曰：「讀書不多，無以證斯理變化，多而不求於心，則爲俗學。」是以於受業者必先令窮經，經術所以經世，方不爲迂儒之學，故兼令讀書史

②。先生爲學之宗旨，卽此可見。故論者稱先生于王學有修正之功，而于清代史學則又爲開山之祖也②。

自燕京淪陷，福王立於南都，而奸人阮大鉞柄政，名捕戴山及諸正人，梨洲亦與其列，乃亡命日本。其後南都覆敗，梨洲更與錢忠介（肅樂）起義師於浙，旋又從魯王於舟山。比兩浙傾覆，戴山以布衣授命。梨洲憂患餘生，始退而專志於講學著述。拳拳故國之思，乃益致力於史學。嘗曰：「自科舉之學興，史學遂廢。昔蔡京蔡卞當國，欲絕滅史學，至欲廢資治通鑑之版，然卒不能。今未有史學之禁，而讀史顧無其人，此人才所以有日下之歎也。」②其慨史學之荒落，詔後生以興起者，可謂情乎溢辭矣。綜梨洲對於史學最大之成就，一爲對明史料之徵存，一爲學術史之創作，而其發爲政論，又多讀史有得之談也。

一、明史料之徵存 梨洲承父師之遺教，忠節凜然。自明之亡，一則避權奸於異域，再則起義師於浙東，三則從魯王於海上。顛沛流離，瀕於百死。自謂「自北兵南下，懸書購余者二，名捕者一，守圍城者一，以謀反告訐者三，絕氣沙墀者一晝夜。其他連染邏哨所及，無歲無之②。其匡復之卓志，洵可炳耀日星。方明統既絕，志事不就，始退而講學鄉黨。自以孤臣之淚，無補於祖國之亡。因搜集南明經營恢復之事蹟，成行朝錄九種③。表章忠烈，言有餘痛。其後乾隆時行朝錄雖以忌諱被燼，然孤本流傳，至今猶爲明季信史之史料。梨洲既熟讀實錄，隱然有自任國史之志。明史案二百四十卷，（行朝錄卽爲明史案一部分之稿本。）今僅存篇目。是否寫成散佚，抑僅定義例，今不可考。要其有裁定國史之志，較然無疑。康熙十七年，詔舉博學鴻詞，避不應徵。次年，開明史館，亦不應聘（時年已七十歲），而萬季野承梨洲之學，毅然以布衣參史局。此外史館編撰，尤多梨洲後學；遇有大事疑題，往往

咨詢取決。其後明史歷志賴梨洲審校而定，而地理志則強半採其所著「今水經」原文^②。此外史料，經其鑑別者尤多^③。而季野之明史稿，爲明史之所本，推原其學，實出於梨洲。是則梨洲雖不躬與修史之役，而所造於明史者已足垂不朽矣。

二、學術史之創作 梨洲既精熟有明一代故實，尤好洞究其間二百餘年學術之源流。因就薛河東（瑄）、吳崇仁（與弼）以下諸儒二百餘人之文集語錄，提玄鉤要，詳考諸儒之源流分合得失，裁定明儒學案六十二卷。梁任公謂中國之有完善之學術史，自梨洲之學案始。又謂不以愛憎爲去取，揭各家之特色，傳各家之真相，明各家之全人格，爲學術史之四大要件，而是書無不具備。因稱其方法精神，大足爲後人取法^④。而梨洲之於是書，亦頗自稱許。一則曰：「講學無宗旨，猶無頭緒之亂絲。是書分別宗旨，如燈取影。」再則曰：「是書纂要鉤玄，未嘗襲前人之舊本。」^⑤三則曰：「分源別派，使其宗旨歷然，……猶中衢之罇，後人但持瓦甌樛杓隨意取之，無有不滿腹者矣。」^⑥初周汝登（海門）與孫鍾元嘗著聖學宗傳，雖體例相仿，而偏執闕略，爲士林所不滿，梨洲因毅然以改作自任，而面目全異。顧梨洲之著此書，初不僅在論述學術，供後人之參稽，而實有更大之義旨，將假此書以自表見。蓋自陽明揭知行合一之教，後繼學者，莫不砥礪德行，故其人身教之功，往往比諸言教爲尤大。梨洲承其風，故其撰諸儒學案，類能傳其精神，期後之學者，各以性之所近而取法，以爲立身行事之本。故其言曰：「學問之道，以各人自用得着者爲真。……學者於其不同處，正宜着眼理會」。又曰：「此書未免風光狼藉。學者徒增見解，不作切實工夫，則義反以此書得罪天下後世矣。」^⑦蓋「以書明心」（梨洲教學者語，見上引），固先生精神之所寄，證以此書，而其理益彰。惜夫後人讀此書者，大抵徒增一二見解，

幾何不以「流俗之士」爲梨洲之罪人耶？

梨洲自謂「自濂洛以至今日，儒者百十家，余與澤望（梨洲弟名宗會）能知其宗旨離合是非之故」^②。蓋明儒之學，追本於宋，而梨洲雖博學窮經，同時亦得力於兩宋儒哲明心見性之學。明儒學案既成，嘗欲上追宋元之學統，標舉數案，僅成十七卷而輟。梨洲歿後數十年，全謝山始追踵其未竟之志，編成宋元學案。梨洲雖未盡展其懷抱，而發凡起例，嘉惠於後人者已不少矣。

梨洲具閎肆之學，抱經濟之才，遭遇國變，遁跡草野。雖矢志不仕異朝，而其於政治社會之見解，鬱積於中，頗復發之篇章，而「明夷待訪錄」一書爲尤著。其中原君、原臣、原法、置相、學校諸篇，尤爲其政治思想精萃之所寄。如謂古以君爲客，今以君爲主，因斥「爲天下之大害者，君而已矣。」^③如謂人臣之仕爲天下而非爲君，因斥人臣「不以天下爲事，則君之僕妾也」^④。如貶三代以下之法令基於家天下之觀念者爲非法，因慨然以爲必「有治法而後有治人」^⑤。如倡「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，而後設學校之意備」，因主張人君當公其是非於學校^⑥。大抵皆博覽前史有所闡發之談，謂之爲政治哲學可，謂之爲歷史哲學亦無不可（本篇以論史學爲主，故於其政治思想不及詳述）。梨洲頗以此書自負，而顧亭林亦稱讀此書「知百王之敝可以復振」^⑦。由今觀之，梨洲之民治思想固不免幼稚淺疏，然因時論世，則在虞騷民約論出世以前一百年頃^⑧，而人世間已有如此反抗君權之呼聲，固不能不認梨洲有過人之史識矣。

梨洲弟晦木（宗炎）治易有心得。子采史，續輯學案，傳其家學。然最能光大其史學者，則爲鄭人萬季野。

四、萬季野與明史

宋元以來，四明攻性命之學者相繼，學風彬彬，號稱鄒魯（見上第一節引）。明代以降，科舉錮人，學風漸替^⑥。陽明挺起講學，後生復知敦品力行。然當時江右（陽明服官江西最久）王門已與浙中比盛。及至明清之間，浙東之王學益衰。蕺山曾創證人社，風被未廣。康熙五年（一六六六），梨洲始再舉證人之會於越中，甬上弟子聞風興起，因亦有證人書院之設^⑦。講經質疑，勝友如雲。於是四明後進，多知求有本之學。而梨洲講學海昌會稽，從遊徧大江南北，顧獨津津樂道甬人士。嘗謂光明俊偉之士，莫多于甬上。又曰：「今海內皆知甬士，精綜六籍，翱翔百氏，危儒行，標清議。……蓋十年以來所稱魯衛之士，必在甬上也。」^⑧甬人士從梨洲游之著稱者，如陳夔獻、萬充宗、陳同亮之經術，王文三、萬公擇之名理，張旦復、董吳仲之躬行，而萬季野最能傳梨洲之史學。

清之初年，鄭有遺老萬履安先生（名泰），砥礪名節，物望翕歸。萬氏爲鄭世家，先世多著忠節儒術。履安嘗從魯王，國變後以詩見志，與黃梨洲游而尊其學^⑨。有子八人，並令受學於梨洲門下。其卓然尤可稱者，爲公擇（名斯選，履安第五子）之理學^⑩，充宗（斯大，第六子）之經術^⑪，而季野（斯同，第八子）獨以史學著。季野從梨洲學，守父師之教，絕意於科舉仕進。博聞強識，於書無不讀，而尤長於史。凡歷代制度沿革人物，莫不洞然腹笥，于有明各朝實錄，幾能成誦。此外凡野史邸報家乘，復多涉覽。蓋梨洲以遺民之心治明史，至季野益于此致力。及清廷開明史館，（康熙十八年即一六七九）崑山徐元文（乾學之弟）任總裁官，既徵梨洲不起，乃延季野往。季野秉父師之教，義不食清祿，